

（上接第一版）市人大常委会将该案列入2021年全县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专项监督工作。随后，行政机关成立联合办案组，经过专家评估后制定了封闭隔离管理的方案，对“小冰岛”进行安全整治。

“春色满园关不住，很多游客还是慕名而来，所以我们向乡镇建议在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后，把这里打造成真正的景点，也能村集体和村民增加收入。”张帆介绍说。经过充分论证，当地村镇与大学生创业团队合作进行公司化运作，在“小冰岛”建设观景平台和露营地，改造湖岸旧厂房开设咖啡馆、餐厅。据统计，节假日游客最多的一天仅咖啡就卖了8818杯。

“有感于‘检察蓝’的帮助和湖深水蓝的特点，我们将‘小冰岛’改造提升项目命名为‘深蓝计划’，这个景点也命名为‘深蓝一号’。”红庙村的90后村干部王永告诉记者，项目实施以来，该村集体经济收入从不到30万元增长至200万元，实现了从“空心村”到“网红村”的转变。“我们结合田园风光和森林草地打造的‘深蓝计划’二号、三号露营地也渐次迎客。”王永眼中充满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吉“小冰岛”由野生景点到网红景点的蜕变中，人大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浙江全省共有637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加入“益心为公”志愿者团队，通过参与检察公开听证会、整改效果评估会等，促进生态保护的共建共治共享。

环境保护“慢不得”，绿色发展“停不得”

“把这两座山”的道理延伸到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上，还启示我们，工业化不是到处都办工业，应当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

——2006年3月2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发表评论《从“两座山”看生态健康》

如果你打算乘坐高铁到浙江省淳安县，会注意到终点站叫“千岛湖站”而非“淳安站”。的确，现在千岛湖蜚声海内外，而其所在的淳安县反倒少有人知。但在1950年代，淳安县给人足，是名噪一时的“甲等县”。

1950年，为了解决华东地区的饮水、用电等问题，国家建设了新安江水库（即千岛湖），原淳安、遂安两县城和30万亩良田

淹没水底，255家企业外迁。超八成县域面积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淳安，从此告别了发展大型工业、保护好千岛湖的一湖碧水，则成为使命与担当。

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是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工作期间的基层联系点，他曾多次到该村调研指导工作。时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姜银祥后来在《习近平在浙江》一书中回忆说：“那时候，他每次到下姜村来，都会一再嘱咐教育我们，要把山林保护好、把水保护好。他多次跟我们说，山区人民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经济发展一定要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牢牢扎根于每一个淳安人的心底。2022年10月，一位“益心为公”志愿者向淳安县检察院反映，抖音上有一段短视频称千岛湖内出现了“清道夫”。“清道夫”学名“豹纹脂身鲶”，是一种原产南美洲的外来入侵物种，会吞食本地鱼类的鱼卵，争抢食物和生存环境，其掘洞产卵行为还会造成河堤水土流失，改变水体养分循环。

“我们与公安局、农业农村局、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多方摸排了解到，余某擅自在千岛湖镇求坑源水库上方、咸坪镇青联村码头等地建造池塘，养殖‘清道夫’并作为观赏鱼出售。其中一处水池发生坍塌，导致‘清道夫’通过溪流进入求坑源水库。”淳安县检察院检察长许哲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心中就一个信念，必须要在下个汛期到来之前清理掉水库中的“清道夫”，因为汛期时水库的水会经溢洪道流入千岛湖，可能导致“清道夫”外逸至整个千岛湖水域。

但受疫情、天气、施工等客观因素影响，原先商定的清库工作一直未能顺利推进。2023年4月，淳安县检察院向属地乡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书。收到检察建议10天内，属地政府在渔产技术人员和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指导下，在溢洪道分段设置4道定制拦网拦截，启动启闭机排水，再对捕获的“清道夫”进行无害化处理。

千岛湖一碧万顷，有赖于上下游的协同发力。淳安县检察院牵头与毗邻的浙江省建德市、以及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休宁县、歙县、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等地检察机关建立了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检察协作机制，助力新安江—千岛湖跨界水体联保共治。

千岛湖千峰耸翠，也是守护生态安全的屏障。浙西群山与黄山山脉山水相连，从一定程度上说，淳安、桐庐、临安、富阳等地的莽莽松林是否健康，事关黄山松的生存。作为这些县域的上一级，杭州市检察院部署开展了一项松材线虫病防控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

松材线虫病是对我国森林危害最为严重的林业检疫性病害，松树一旦感染松材线虫，最快40天即会死亡，3至5年便可摧毁成片松林，因此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松材线虫肉眼看不到，它主要依赖媒介昆虫传播，比如松墨天牛。携带松材线虫的天牛成虫在啃食松树皮时，线虫幼虫会从伤口入侵健康松树，在树脂道内大量繁殖。松树感染线虫后生长衰弱或死亡，又成为天牛的产卵之地，如此重复，导致病害扩散蔓延。”参加过此次专项行动的桐庐县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王亮，谈起来俨然专业人士，“因此治理这种病虫害有个最佳‘窗口期’，就是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在天牛羽化前及时清除枯死的松树。”

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乡镇政府。2023年3月，“窗口期”临近关闭，但桐庐县检察院发现某乡作为松材线虫病疫情严重地区，仍有大量枯死松树未采伐，还有很多伐倒的枯树未及时清运，遗留在山林。

“我们很快向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一般检察建议的回复期是2个月，但鉴于‘窗口期’已快结束，因此我们提出了15日的回复期。但回复期届满后，乡政府并未回复及整改。”王亮告诉记者，该院联合县林长办实地调查取证后，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进入诉讼程序后，迎来了职能部门重视和迅速行动。该乡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及专业除治人员包片巡查、逐点逐片整改，并通过验收。因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桐庐县检察院撤回起诉。

记者了解到，在浙江省检察机关2024年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中，针对环境资源领域未整改案件，共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9件，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始终强调，要充分运用刑事打击、民事行政监督、公益诉讼等各种手段，加强与各职能部门衔接配合，持续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更好服务绿色发展，而事实上，法律监督的刚性，也

斩首、烧杀、瓦斯杀等极端残忍手段虐杀俘虏。在铁证面前，战犯们终于低下了头，顽抗态度也有了一定转变，但仍对部分证据进行反驳。为了确保侦讯工作万无一失，东北工作团又进行了多次证据复查工作。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工作使战犯意识到，所谓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日本侵略的需要，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财产损失。

秦耀东回忆，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方面佐证：审讯笔录、战犯自述材料、证人证言、档案材料、同案犯检举。形成的卷宗“每个至少有一尺厚”，经上级批准后交给战犯本人逐页签字确认。“日本战犯都看得很认真，一页一页地签字，心服口服外带佩服。”秦耀东说。这些曾任意凌辱中国人的战犯没想到中国检察官对他们没有一句辱骂，更无任何刑讯。

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铃木启久、长岛勤等8名日本战犯。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日本侵华战犯进行的大规模审判，也是中国人民在司法领域对侵略者的一次正义清算。当法庭调查铃木启久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村屠杀1280名村民的罪行时，44岁的幸存者周树恩出庭作证。他解开衣服露出遍体伤痕，控诉日军用活埋、刺杀等野蛮手段杀害全村百姓的暴行。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痛哭认罪：“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长岛勤的笔供在法庭上被一一呈现。面对如山的铁证，这个曾嚣张跋扈的日军少将当庭忏悔：“我的罪行实在是无比凶恶和残暴，它是已经写在历史上无可否认的事实。”最终，长岛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铃木启久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69年后，当秦耀东再次看到战犯们带来的东北工作团老照片，提到长岛勤那件事时，他依然难掩愧疚：“能参与日本战犯的审讯工作，我非常荣幸，我觉得我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

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

走入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记者仿佛能感受到1956年那场正义审判的庄严肃穆。逼真的蜡像场景重现了36名日本战犯低头认罪的历史瞬间，连审判长席、检阅员席、被告人席的细节都1:1复原。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以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是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展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捍卫民族尊严的真实缩影。

“沈阳审判是新中国第一次独立主持的国际战犯审判，完全依据法律程序，未施加任何酷刑或辱骂。许多战犯在法庭上面对幸存者的控诉时，当庭下跪痛哭。”秦耀东感慨地说，这场审判不仅惩处了战

是各相关部门推动工作时希望借助的“东风”。无论是“河长制”发源地浙江省长兴县的“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还是杭州市检察院同该市长林长办、河湖长办、田长办建立的数字化“四长协作机制”，抑或是浙江省检察院与该省农业农村厅等17个部门建立的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都在畅通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推动执法司法衔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浙江全面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法院、检察院向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生态环境、生态安全、生态经济、生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方面工作情况。

造美于乡村、造福于乡民、造梦于乡土

“生态是可以富县的，生态好不仅可以富县，而且可以让老百姓很富，是很高境界的富。”

——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调研时指出

“七山一水二分田”，形象地说明了浙江的地理特点，这也意味着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矛盾。2003年，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后抓的第一项重点“三农”工作，就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下称“千万工程”），通过村庄整治和农村新社区建设，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20多年的久久为功，让浙江农村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村美了。“过去卖木头、卖石头，现在卖空气、卖风景。”这样的故事在浙江有很多。

长兴县小浦镇八都弄（音ka，当地方言中意为两山间的狭长地带）位于天目山余脉与太湖流域交界处，两山排阔，一涧中流，方岩村等5个村庄掩映在3万余棵原生态银杏林间，尤其是其中更有3448棵百年以上古银杏树，造就了“十里银杏长廊”的生态奇观。

当地人叫银杏树是“白果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银杏树白果的市场价达30元一斤，是当地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那时候家里的农家肥都舍不得撒到稻田里，全部用在白果树下。白果成熟的时候，

最高检发布

江西检察机关对孙劲涛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记者崔晓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日前，江西省吉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孙劲涛(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江西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江西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九江市检察院依法向九江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981年8月，52岁的秦耀东本计划着退休生活，但组织交给她筹建辽河油田检察室的光荣的重任。筹备组人手短缺，年龄参差不齐，一切从零开始。他负责批皮、建办公楼、遴选干部，跑遍市场选购建材，精打细算，院里的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都是他反复挑选的。最艰巨的是培训检察人才，他从辽河遴选100多名干部，送至鞍山市检察院学习培训整整一年，才有了院里第一批检察干警。1984年，辽宁省检察院辽河油田分院正式挂牌，秦耀东成为首任检察长。1985年盘锦建市，秦耀东又兼任盘锦市检察院检察长。经过三年“孵化”，1988年，两家检察院顺利分设独立。

1989年，年满60岁的秦耀东该退休了，但因工作需要，他无条件延迟至1993年退休。40余年检察生涯中，他参与了三院四地检察机关的组建，两次获得最高检荣誉奖章。

2019年4月，辽宁省检察院辽河分院迎来一位特殊讲师，90岁高龄的秦耀东以“70载党龄老检察长”身份，为年轻干警讲述检察初心。他展示了一份珍藏的剪报——2014年7月8日的《辽沈晚报》，刊载着中央档案馆解密的长岛勤罪行档案。“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楚地记得4名战犯的姓名职务。”秦耀东声音哽咽，“能参与审讯工作，我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

回顾96载人生，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检察官的总结朴实而深刻：“我这一生很幸运，中学毕业后遇到共产党，走上检察道路。虽然中间有曲折，但我代表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我的一生是光荣的！”秦耀东说，我们与日本战犯的较量，是法律的胜利，更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铭记。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检察人，他以坚定信念、严谨作风和无私奉献，为正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片摄影：本报记者张哲）

（上接第一版）

其次，还要让相关部门明晰如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共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治理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检察机关在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中肩负双重责任，既要确保自身严格依法办案，又要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促进其他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很多情况下，环境违法行为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比如一家旅游公司租用湿地开发露营地，违规进行伐木、堆土、建木屋等活

我们都是提着油灯连夜守着，掉下来就赶紧捡起来，我们的学费就靠它了。”方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许建中回忆说。2000年以后，白果价格骤升至几块钱，果贱伤农，村民对银杏树的管护就不那么上心了，再加上当地发展农家乐、民宿，翻建房屋、硬化路面，房前屋后、道路两边的银杏树生存状况堪忧。

“2021年11月银杏叶黄的时候，我们关注到有游客反映八都弄部分古银杏树落叶提前，叶量稀疏，有的还被钉钉子、悬挂网线。”长兴县检察院检察长屠晓景告诉记者，他们经实地调查发现，有323棵古银杏树下地面被水泥硬化，有523棵周边堆放杂物、建筑压迫，有181棵长势衰弱。

长兴县检察院向浙江省检察院汇报线索后，省院决定以省、市、县三级检察院一体化办案方式办理此案，同时以开展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衔接转化机制试点为契机，会同省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局等办理省政协委员陈三联提出的第408号重点提案《关于加强古银杏树等古树名木依法保护的建议》。

在公益诉讼办案磋商会暨重点提案推进会上，检察机关提出专项整治、依法养护、长效保护等意见。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乡镇随后开展“银杏深呼吸”专项行动，拆除过度硬化地面，对超审批范围违建破坏古银杏树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对长势衰弱、濒危的古树制定“一树一策”……

“我们每年投入80万元养护古银杏树，还组建‘杏福’守护联盟，发挥村干部、义工的作用，比如眼前这棵老树中长出新树的‘怀中抱子’，被村民房屋挤压生长空间，我们就动员村民易地搬迁。”站在这棵1500年的古银杏树下，许建中介绍说，通过申报“浙江省林业推进共同富裕综合体”试点任务，开发古街、漂流、垂钓、观光索道等旅游项目，举办银杏旅游文化节，以及制药、美容等白果深加工产业，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持续增长。

记者了解到，八都弄的齐观民约这样写着：“银杏古树要爱护，前人栽树后人富。勤打果来多施肥，毁林毁树要判刑……”

以办理此案为契机，浙江省检察院、林业局在全省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办理相关案件273件。

2024年1月，最高检印发《关于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服务“三农”工作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护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八项办案重点中的两项。

浙江省东阳市内靠近磐安县的地方有一处古道唤作车慈岭，传说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年少时与家人避“靖康之难”住在磐安县，常用推车带母亲到东阳等地游玩。一次行至此处时在一块平坦巨岩上休息，众人提议给此地命名，陆游恰好手扶推车，遂取名“车慈岭”。

“事实上，车慈岭是东阳通往天台、仙居等沿海地区的一条‘茶盐古道’，古道旁建有平岩塔亭和慈岭亭供过住行人歇息。”东阳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蔡向萍向记者介绍。走到一片古树处，她还介绍说：“这些枫香树有200多年了，每年秋天时红叶特别漂亮，游客特别多。”

然而，2024年初，东阳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平岩塔亭和慈岭亭的墙壁上被乱涂乱画，周边垃圾也无法清理。“根据《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古道保护的内容包括附属的古亭、古桥、人文遗迹等，禁止在历史遗迹、相关设施上刻画、涂污以及乱扔生活垃圾等。”蔡向萍说。

经现场勘查、走访调查、取证固证，东阳市检察院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属地镇政府磋商后，确定镇政府牵头对古道景点被破坏之处进行修缮、粉刷，并落实相关村的管护职责。

炎炎夏日，记者走在车慈岭的山林间，便觉一股爽气拂过山岗。坐在古亭中，干净整洁，可以“放空”，可以小憩。极目远眺，只见山下屋舍俨然，阡陌纵横，鸡犬相闻。

本次采访的最后一站，记者来到了浙江省义乌市李祖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该村考察调研时说：“李祖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

远处青山隐隐，近处小院精致，全国人大代表、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方豪龙带着记者在村中穿梭：“这里是当时为了改变村民在塘中洗衣洗菜导致水体发臭而建的生态洗衣房；那里是盘活闲置老屋吸引外地人前来创业开的进口商品馆；还有匾额上题写‘缩影’二字的牌楼，总书记当时就是站在那里给我们讲话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20年前在一个浙北山村诞生的科学论断，今天已在新时代的中国结出累累硕果——中华大地蓝天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题图：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

秦耀东：代表亿万中国人进行正义清算

（上接第一版）

照片中，后排右侧并肩站着两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正是秦耀东和陈式琴。

时光荏苒，69年过去，照片中的大多数人已离世，这两位老人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者，共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现在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是刻在骨子里了……”秦耀东向记者回忆起那段鲜为人知的艰难历程，思绪慢慢展开。

贫苦农家走出的新中国检察官

1929年12月，秦耀东出生于黑龙江省五常县（今五常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给他取名“长喜”，寓意吉祥。尽管家境贫寒，父亲仍坚持让他读书，希望他改变命运。10岁那年，长喜终于走进学堂，老师为他取名“秦耀东”。

凭借勤奋，秦耀东小学读到初中，成为当地少有的文化人。辍学后，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员，后来甚至兼任校长。1948年，全国尚未完全解放，黑龙江的共产党工作仍处于半公开状态。由于表现突出，土改工作队于长江同志介绍秦耀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踏上革命道路。

1948年12月，秦耀东成为一名公安助理。一年后，区政府派他到东北公安干校学习一年。

“1950年夏末，公安干校的学习马上就要结束了，领导说在培训的600多人中留下60人在东北公安部工作。在学习培训中，我的表现很突出，按常理应该会被留下来。可是随着一批一批名单的公布，我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心情也一天天低落。”秦耀东回忆说，“直到最后一批名单公布了，上面只有5个人的名字，也包括我。领导宣布这5个人因表现优异被分派到刚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工作。”

从那一刻起，秦耀东从公安干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检察干警。1950年至1953年，他跟随老红军虎龙参与组建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刑事检察处，指导东北各省检察工作，巡查镇压反革命运动，为新生政权保驾护航。1953年，东北分署撤销，他调到鞍山市检察署，继续在检察战线奋斗。

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

1950年7月19日，绥芬河火车站见证了第一次历史性交接。根据《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及相关国际法例，苏联政府向中国正式移交了被苏军俘获的969名日本战犯。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3年冬，一道紧急命令改变了秦耀东的人生轨迹。最高人民检察署（1954年9月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征调优秀检察干警赴京学习。新婚不久的秦耀

东暂别妻子，踏上进京之路。3个月后，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降临——中央决定对在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进行审讯和起诉。

“这是一项历史性任务，可以代表亿万中国人审讯日本战犯的罪行，怎能不让人激动又自豪？”时隔70余年，秦耀东向记者回忆起当年仍心潮澎湃，“可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压力又像无尽的海浪一样冲刷着我的心。”

“侦讯工作面临两大难关：一是手头掌握的证据少；二是这些日本战犯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思想毒害，顽固不化。”秦耀东说，1954年至1956年，他作为小组的审讯员，带着一个翻译和一个书记员负责4名战犯的侦讯工作，其中包括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少将旅团长、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当审讯人员要求战犯如交代罪行时，这个罪行累累的侵略者竟多次以傲慢的姿态宣称：“我们来中国不是侵略，是为中国建设而来的。”

不仅如此，战犯内部还结成对抗联盟，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侦讯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更严峻的是，苏联移交战犯时提供的材料仅有两页写着姓名、年龄和籍贯的稿纸。“面对战犯们的狡辩，我知道，只有找到更确凿的证据，才能让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低头认罪。”秦耀东说，面对证据严重缺失的困境，他们奔赴山东、河北等地，在日军曾肆虐的土地上寻找幸存者 and 证据。

一场规模空前的证据搜集行动在全国展开。“东北工作团从全国抽调200多人，开展大规模调查取证。从战犯任职地点的档案到伪满报纸，从战犯同僚的供词到战犯亲友的走访，我们常常为了到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而远赴千里。”参与侦讯的东北工作团检察员郭春来当时负责伪满系统的调查取证，他和同事翻遍了从东北各地调取的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最后从种类庞杂的材料中查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如当时会议的参与者、命令的下达者、被捕捕者、命令执行者，甚至是日本战犯亲笔签署的命令等，并都形成了文字记录。

“从东北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最后我们住的房间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秦耀东回忆道，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审讯组发现了关键证据：日伪时期的会议记录、行政文书、命令文件，清晰记录着战犯的罪行。当长岛勤看到自己亲笔签署的作战命令时，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

秦耀东至今记得，长岛勤的笔供长达29页，最后一页有他的亲笔签名和手印。长岛勤在供述中承认：1942年4月至1945年7月，指挥15次作战，杀害抗日军民660名、平民970名；烧毁民房2220间，逮捕抗日军民1220人；掠夺粮食6000吨，强征劳工12万人；采用刺杀、斩杀、